

捧读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陈平原:阅窗外事,读圣贤书》一文后,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因撰写《报人赵超构》,多年来我与陈老师的爱人夏晓虹教授有过联系。她给予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从中发现她的父亲与新民报的历史渊源,还有跟老社长赵超构的深厚情谊。

# 刘岚山的新民缘

富晓春

夏教授随母亲姓,她的父亲姓刘,名岚山,是一位从安徽和县鸡笼山下走出来的诗人。刘岚山与赵超构结识于重庆新民报时期。他进新民报是《华中日报》一位副刊编辑介绍的,最初干的是校对工。那时,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想方设法接触进步书刊。不管谁的手头,有了一本好书,他们会轮流着看,当年的几本《译文》旧杂志,还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都是他们竞相抢阅的床头书。

赵超构很快发现,刘岚山的心思不在办报,他的兴趣在搞出版、出丛书、办诗刊。果然不出所料,一年多以后,刘岚山就离开新民报,自立门户,在重庆涪陵办起了“山野书店”。赵超构偶尔会到刘

岚山的书店逛逛,随便翻翻新到的书。兴致所至,他们还会在店里摆上小方桌,抿上几口老酒,侃大山。刘岚山在《我与山野书店》一文中,还无意间透露赵超构前来打牌找乐子的事。

1943年旧历新年过后,赵超构又来到“山野书店”,却发现店门紧闭,一种不祥之感漫上心头。他四处打探消息,终获知刘岚山已回重庆,暂住南岸郊区炼油厂,在南方印书馆担任助理编辑。他还未及与对方取得联系,就得到刘岚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消息。

1946年,赵超构从重庆回上海创办《新民报》晚刊,某日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个蓬头垢面、灰溜溜的人,定睛一看正是刘岚山。原来当年他因牵涉出版进步书籍而入狱二年,出狱后曾赴解放区,后因家庭突发变故,便又辗转来到了人地不熟的上海。

赵超构见状,就让他留了下来。赵超构让他重操旧业做校对。当时编“夜光杯”副刊的,是在上海滩负有盛名的诗人袁水拍。校对也有分工,刘岚山除了新闻稿外,还负责副刊;帮忙计算稿费字数,偶尔也凑版面或补白——其实,他已参与了部分的编辑工作,因此与袁关系亲近,后来成为至交。袁

今天上海解放纪念日,同时也是复旦大学校庆纪念日。前几天,我作了一首小诗:学步邯郸梦犹在,风雨同舟六十载。此行重走人生路,脚云相辉共徘徊。这诗记录了5月3日一次情景交融的纪念活动,此举也是我们献给母校119年华诞的心香之瓣。

是日,正值“五一”劳动节放假之时,复旦园里游人如织,一路欢声笑语,朝气蓬勃,长者们为何要“轧闹猛”呢?我们这拨老复旦,1959年进校,五年制本科,



松风煮茗 竹雨谈诗 (书法)毛节民

水拍夫妇是苏州人,袁夫人做得一手好菜,赵超构与刘岚山偶或上门吃饭。三人喝酒吃菜,细饮慢啜,好不长兴。

1948年11月,赵超构、袁水拍等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先后“走避”香港。刘岚山临危接手“夜光杯”编务。据老报人张林岚说,此属于“私相授

1964年毕业于,至今已近60年了。乘北京老同学节假日南下沪上探亲访友,便开启了我们的“复旦历史系64届毕业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上午聚会上海图书馆,看往日活动录像,座谈。会议由徐爱珠主持,她以“64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贯连的历史命题开篇,牵引起与会者的话语。吾班诗人代表洪金魁朗读了外地同学的贺词和自己新创作的二首七律诗,其声嘹亮激昂,与徐的淳美之音相联翩。临近结束,颜声毅发言道:“我们64届的同学们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毕业后无论从教、从研、从政,都写下了每个人生命履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章,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回顾往昔,可以用‘不悔今生’四个字来归纳。”“不悔今生”,可为64届代言,也道出了全班每一个同学的心声。

下午移步复旦,寻访当年我们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面包车沿着中环北行,望窗外,春日的阳光一路陪伴着我们,遽然心中响起了百年校庆时唱遍校园的歌:“复旦,我回来了,让你倾听我那无尽的牵挂。复旦,复旦,你是我永远的母爱,复旦复旦,你是我永

受”,换言之就是“教一个校对暂时照看一下,每天发点稿子填满版面”。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刘岚山一直坚持在岗位上,“夜光杯”在他手中一天也没有停过。老报人张林岚曾专门著文,称赞他是“桅灯高举的留守者”。到了次年三月,国内及上海形势愈发吃紧。据夏晓虹教授回忆:“某日,父亲突然接到国民党党部部的通知,要夜光杯编辑前去开会。父亲本有左翼倾向,处此时局,更觉危险。经与朋友反复商量、研究,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抓捕的圈套。于是父亲急忙脱身,转赴皖南游

没有什么比《追忆似水年华》开头的那种句式,更能形容出我与公交车之间晃晃悠悠的情愫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是早早就上车了,有时候,窗外细雨,黏在车窗的水珠上,折射出都市绚烂的夜色。我就此盯着出神,都来不及嘟囔一声:‘到站了。’一会儿以后,我才发现自己被公车又带到了一片新奇的地方,这可能正是探索的开始。”

那会儿还是小学。我家从愚园路的老式石库门房子搬到古北路的新式公房。现在来看,也就是五六公里路程,但彼时却要换两部公交车。不论是20路换54路,还是44路换71路,总之,我频繁地通过这两部车往来于旧居与新居之间。

在好多个“大礼拜”——当时还没有双休日,而是一周休息一天,隔一周休息两天,我们把休息两天的那周叫作“大礼拜”——大礼拜那周,母亲通常要洗床单晒被子,早早地把我从床上赶起来,从家门口挑选一路公交车,挨个一站一站去探索。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71路是上海所有公交车中最有地位的一路车,这可能是由于,从外滩到古北串联起来的是上海这四五十年轻西行发展的变迁史,这样一段既令人人生畏又令人澎湃的路程,由71路细细途经,这怎么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呢?而终点站正在家门口的54路又预示着另一番情绪的转变。它一路大多随着苏州河边,蜿蜒穿行,周家桥、三角场、中山公园、市三女中、

# 不悔今生

张广智

系上两位小友来迎。我特邀国伟当“导游”,他有满腹的校史轶事,满脑的趣闻故事,可以串成一部别样的复旦校史,有这样一位校史专家为我们讲解,幸矣。

我们在老教学楼(今为第一教学楼)前驻足。且把时空切换到59年秋,从三楼1239教室传来了宏音:“一个怪影(现译为‘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它穿越111年的时空隧道,在这座楼里飘荡,响彻东方……这个为历史系一年级学生新设的《马列主义基础课》,首篇就由袁维辉先生执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深深地蕴藏在59级学子的心坎里。

雨丝风片,烟波楼宇。1947年建造的登辉堂(今相辉堂)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我们念书时,登辉堂是全校政治和文化中心,尤其是后者,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登辉堂每周要放两次电影,这是我们这一辈难忘的共同记忆。拍合影后,王鹤鸣和我、林仁川回忆当年三人一起参

击区。”

在上海《新民报》晚刊的三年,是刘岚山创作的“井喷期”。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其中颇具影响的是《中国作家访问记》系列采访,先后介绍了郑振铎、魏金枝、叶圣陶、臧克家、穆木天、杨晦、姚雪垠、陈白尘、马思聪、许杰等名家。刘岚山兼职或专职担任“夜光杯”副刊编辑虽时间不长,却培养与发现了一批文学新人,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圣野——当时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经他手在“夜光杯”刊出的。

刘岚山与赵超构、袁

远的家。”车从东校门进校,78级系友、知名文史作家读史老张(张国伟)和

加首次全国性考研。考试前夜,大雪纷飞,晨起偌大的校园,竟是一派北国风光,我们踏着三四寸厚的白雪,向设在考场的登辉堂漫步。考场甚冷,几盆炭火,根本无济于事,考生们埋头答题,哪还顾得上这些。这次考研全国统考,是一段多么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漫步校园寻旧迹,六号楼前芳草萋。读史老张说,这楼可简单呀,留下了一届又一届的历史学子的足迹,现为任重书院的学生宿舍。一走进楼门,往左第一间,林仁川就像回到久别的家。他难抑激动:“我入学时就住在这个房间啊。而且,这间房与我同住的还有我三个高中同班同学。”在复旦历史系系史上,一个中学同一班级被我系录取4人,真是一则学林佳话。

夕阳西下,车子缓缓驶过正校门,大家向母校挥手告别。64届96位同学中,14人作为代表。时光荏苒,同窗五年,赋予我们的“复旦基因”;六十年走过的似水年华,铸就我们的“复旦精神”,永不消逝。重走当年在复旦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感慨万分,那一草一木似乎也在为59级点赞,那一砖一瓦亦为64届歌吟,正是:“不悔今生”情切切,春风常绿青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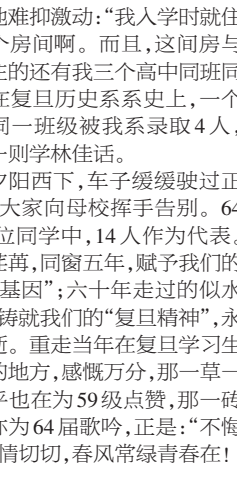
交集。在她父亲100周年诞辰之际,我又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悼念这位成名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目前已经很少有人提及的革命诗人。”

当《报人赵超构》即将付梓时,夏晓虹教授满怀期待给我留言:“对其中有关我父亲与赵超构的交往部分尤感兴趣。”我给她寄去新书,她又在邮件中说:“文章写得很生动”,“非常感谢你的钩稽与叙述,也期待(你的)新作”。

后来,我在拙著《报人赵超构》中专门写了一节“奇伟的‘好人’”,介绍她父亲刘岚山与《新民报》的

特别慢似的,却因此记录下少年生命里最值得纪念的漫步和等待。时隔30年,我最爱坐的依然是96路,最爱走的依然是这一段路,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喜爱,成为了一名都市历史文化爱好者、从业者。再说两路记忆深刻的公交车吧。一路是101路。当时有一次和一位素未谋面的“笔友”见面,但却想不出约在哪里见面才好。不知道是谁,灵机一动说,我们看看地图,挑选一部路线最长开到最远的公交车,我们从终点站坐到终点站,一路聊天看风景,岂不妙哉?于是整个下午,我们坐了一圈又一圈,2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们仍然是知心好友。

还有一路是21路。1995年是我21路的“蜜月期”。在这之前,我的生活半径向北没有跨过苏州河。但那一年,众所周知,申花足球队在虹口体育场拿到了甲A联赛冠军,而正是21路,把西区的我第一次带到了市北的虹口区,带到了申花队夺冠的那个辉煌时刻。那时候,每一场申花比赛结束后,大约有成百上千神魂颠倒兴奋不已或沮丧不堪的年轻人坐着21路回顾着这一个夜晚,哦,还有一半人去坐18路了。大家不分彼此,车子一离开,一路聊:“哦,成都路到了,我先下去了,下次球场见哦!”还有几次,有些人聊得太投缘,到站了也不下去:“没关系,我陪你坐到中山公园,我再掉头坐回来!”售票员忍不住提醒——“末班车来!”



特别慢似的,却因此记录下少年生命里最值得纪念的漫步和等待。时隔30年,我最爱坐的依然是96路,最爱走的依然是这一段路,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喜爱,成为了一名都市历史文化爱好者、从业者。再说两路记忆深刻的公交车吧。一路是101路。当时有一次和一位素未谋面的“笔友”见面,但却想不出约在哪里见面才好。不知道是谁,灵机一动说,我们看看地图,挑选一部路线最长开到最远的公交车,我们从终点站坐到终点站,一路聊天看风景,岂不妙哉?于是整个下午,我们坐了一圈又一圈,2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们仍然是知心好友。

还有一路是21路。1995年是我21路的“蜜月期”。在这之前,我的生活半径向北没有跨过苏州河。但那一年,众所周知,申花足球队在虹口体育场拿到了甲A联赛冠军,而正是21路,把西区的我第一次带到了市北的虹口区,带到了申花队夺冠的那个辉煌时刻。那时候,每一场申花比赛结束后,大约有成百上千神魂颠倒兴奋不已或沮丧不堪的年轻人坐着21路回顾着这一个夜晚,哦,还有一半人去坐18路了。大家不分彼此,车子一离开,一路聊:“哦,成都路到了,我先下去了,下次球场见哦!”还有几次,有些人聊得太投缘,到站了也不下去:“没关系,我陪你坐到中山公园,我再掉头坐回来!”售票员忍不住提醒——“末班车来!”



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却从来没有在校园里遇见过。工作之后,我们在上外的课堂里相识了。她说话细声细气喜欢穿长裙,笑的时候眉眼弯弯,还有两个酒窝。我的朋友,都是像我一样的性情中人,经常自以为清醒地剖析自我和对方,用“毒舌”伤害了对方却不自知,冷静了又觉得“诤友”可贵,彼此打击也相互取暖。她,却是另外一种存在,她是“正”,我是“邪”,她喜欢看我的平实的文字,我欣赏她的理想化和水一般的温和透明。

我们的职业道路大相径庭。她毕业之后进入一所几乎人人仰

望的名校,在那所在我看来学生、家长、教师都“卷”的地方耕耘多年。我,对于职业生涯只有一份浅尝辄止、知难而退的心意,可是对于把职业理想化、事业化的人们我有发自内心的敬意和羡慕。她,在那所学校里教着一门被冷落的副科,对于这门一般人觉得意义不大前景迷茫的学科,她全情投入,开发了自己和学生的全部潜能,用英文授课,修习第二外语,花三年时间研读了心理学方面的高级课程,设立了由她主导的工作室,成了挑剔的学生心中的“女神”。学生申请海外名校时找她这位副科老师写推荐信,她感到分外骄傲,开心得就像一个刚入行刚被认可的年轻教师。

我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爱上了心理学,她是为了“助人”,我却只是为了“助己”。她推荐我看的书,越来越高级,习惯了“风吹哪页看哪页”的我不得不跟着她小跑了一阵。

若干年后,女儿进入了理想的学校,承继了我的率性和有限范围内的桀骜不驯,一度让我陷入各种自责。我曾经以为,如果我是她,或许女儿能成为“别人的孩子”。那一个阶段,我们交流了很多,即便是她,也没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理想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当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共同经历了一段磕磕巴巴的岁月,有心情重新审视自

# “不装”与“不作”

忻之涓

我总以为,以她把职业当作事业来追求的劲头,以及多年的勤劳耕耘,一定能达到理想的职业目标,又隐约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世界。去年的某一个冬日,在被阳光洒满的玻璃茶室里,我,第一次成了她的倾听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她以为的众望所归中,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出局。在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的大型活动中,她被多年敬仰的同僚加领导骂哭了。我安慰她,我们只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发脾气,在单位也一样,我从来没有机会被大领导骂,除了握手。她失笑,但我能感到,她被伤到了。她的委屈和迷茫,让我心里有点小小的难受和释然。难受的是她的失意,释然的是,我们终于互换了角色。

第二天,我收到了她的微信,她说:谢谢你点醒了我,让我看到了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角落。

“不装,不作。”这是她对自己的认知。我心想,这是在说我吗?

“不装”与“不作”的世界多么简单,做这样的自己,有这样的朋友,又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 十日谈

生命中的光 责编:殷健灵

在你的童年,有没有一个人给你“没原则的爱”?